

“美好”的虚饰

——《穿红衣的人》对“巴黎美好时代”的重构

刘丽霞 刘佳利*

【摘要】朱利安·巴恩斯的近作《穿红衣的人》揭示了“巴黎美好时代”这一名称对历史的虚饰，并围绕法国著名医生塞缪尔-让·波齐的人生和社会交往，以人带史，以独特的视角和详细的文史考据重新勾勒了当时法国社会的主要风尚：浮夸的丹蒂主义和多元的两性关系；同时，他以当时影响深远的德雷福斯事件作为主要政治背景并以当时社会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决斗和枪杀——来凸显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沙文主义的盛行，他以史喻今，以当时盛行的排外主义昭示当下的英国脱欧现状，表达了强烈的现实关照。巴恩斯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在重构历史的同时反思历史书写本身，融合历史、文学文本、传记和评论等众多文体，并穿梭于英法两国的文化对比以及艺术与生活的复杂转换之间，在建构历史的同时深刻反思虚构与真实的复杂关联，体现了一种多维的真实意识，同时揭示了其随笔与小说创作在某些层面的互文与同质。

【关键词】《穿红衣的人》；社会风尚；沙文主义；多维真实

序言

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1957—）同时也是资深的评论家和散文家。目前为止，巴恩斯已经出版了八部散文随笔作品。这些作品内容广博，题材多变；其中《伦敦来信,1990-1995》（*Letters from London, 1990-1995*）是巴恩斯在1990年至1995年间受聘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时以一个英国人的视角对当时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评论合集；《无所畏惧》（*Nothing To Be Frightened*）和《生命的层级》（*Levels of Life*）是巴恩斯对个人生活的回忆，透过自己与亲人们的过往探讨记忆、亲情和爱情以及死亡和哀伤等人生主题；《学究下厨》（*The Pedant in the Kitchen*）则是关于菜谱和美食的评论集，巴恩斯在其中以学究固态幽默地考察了各种美食食谱的措辞以及围绕美食发生的有趣社交故事；《有所宣示》（*Something to Declare*）、《透过窗》（*Through the Window*）和《另眼看艺术》（*Keeping an Eye Open*）则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随笔

* 作者：刘丽霞（1977—），女，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刘佳利（1991—），女，鄂尔多斯职业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法国文学视野下的朱利安·巴恩斯创作”（HB20WW002）阶段性成果。

集。作为一名法国文学艺术的热爱者，巴恩斯的文学和艺术随笔大多集中于法国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过渡这一段时期，他尤其对1850年至1920年的中间阶段非常着迷，因为在这个阶段“艺术家以真为本并且从根本上重审了艺术的各种表现形式”^[1]，代表了他所推崇的理想文学艺术样态。

2019年巴恩斯出版了第八部随笔作品《穿红衣的人》(*The Man in the Red Coat*)。不同于以往几部文学随笔中对具体文学家或艺术家的评论，《穿红衣的人》转向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即，著名的“巴黎美好时代”(“*Parisian Belle Epoque*”)。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到一战爆发前法国社会曾经历过一段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期间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让法国举世闻名，为此而建造的埃菲尔铁塔也成了法国文明的象征，因此，这一时期通常被认为是法国最具创造性和活力的时代，并被冠以“巴黎美好时代”的美称。但巴恩斯在书中指出：“这种闪闪发光的名号不过是人们在回顾历史时赋予的，生活于1895年或1900年的巴黎人不会对彼此说：‘我们生活在巴黎美好时代，好好珍惜它吧’”^[2]²⁶。他考证了这一名称的真正来源，指出它实际诞生于二战时期法国战败之后，由一个广播节目的名称演变而来，因而，所谓“美好时代”并非那个年代人们的真实感受，而是后来身处战争失败创伤中的法国人对“美好从前”的“温和想象”^[2]²⁶。人们经常将这个时代“援引为充满和平愉悦、迷人中透着几丝颓废、艺术之花的最后盛放、曾经安逸的上流社会的最后荣光”，但巴恩斯认为它对于一些人，尤其是巴黎人，也许是如此，但对其他的法国人则未必^[2]²⁶。在揭示这一名称对真实历史的虚饰的同时，巴恩斯从新的视角重构了这段历史。

重写历史是巴恩斯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法，他的小说《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亚瑟与乔治》(*Arthur and George*)以及《时代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都是以真实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基础进行的虚构创作。《穿红衣的人》虽然是以随笔的形式写成，但在风格上与巴恩斯的小说，尤其是与《福楼拜的鹦鹉》，一脉相承。《福楼拜的鹦鹉》以虚构人物布莱斯韦特对福楼拜写作《一颗质朴的心》(*Un coeur simple*)时模仿的那只鹦鹉的追寻串联起了众多不同的文类以及福楼拜人生和艺术的诸多方面，因此，在大的追寻叙事的基础结构之下可谓包罗万象，有学者这样评论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仿佛一粒石子抛入水中，激起一圈圈涟漪，每一圈涟漪带出一个或几个故事”^[3]。在《穿红衣的人》中，巴恩斯同样摒弃了传统的线性编年历史叙述模式，他以法国当时著名的医生塞缪尔-让·波齐(Dr Samuel Jean Pozzi, 1846—1918)的个人生活和社会交往作为切入历史的独特视角。作为一名移民的后代，波齐思想开通，在其医学领域不断引进先进的科学理念进行革新，同时他交游甚广，与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巴恩斯以波齐作为这一时代的典范，围绕他与众多社会名流，尤其是与诗人孟德斯鸠公爵(Count Robert de Montesquiou Fezensac, 1855—1921)和德波利尼亚克王子(Prince Edmond de Polignac, 1834—1901)的交往辐射当时的文学、艺

术、医学、科学、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一个无限扩张的大漩涡，囊括了当时社会的丑闻、艺术、理论和风尚”^[4]。本文将围绕巴恩斯对这段历史的重构深入分析巴恩斯重构历史的独特视角及其背后的现实观照和对真相的根本认知。

一、重构“巴黎美好时代”的社会风尚

巴黎美好时代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当时英法两国之间的文学艺术交流，是巴恩斯在书中的核心关键词。波奇虽然是一名医生，但他与众多文学和艺术名流保持交往。巴恩斯以波齐、孟德斯鸠和德波利尼亚克王子一起在伦敦购物作为开场。他们一方面拜访像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和画家伯恩-琼斯（Sir Edward Burne Jones, 1833—1898）这样的文学和艺术名流并参观艺术场所，同时也购置一些时尚用品。这种被孟德斯鸠称为“风雅的装饰性购物”（“intellectual and decorative shopping”）不仅展示了当时英法之间的文化互动，也引出了当时盛行于海峡两岸的一种社会风尚：丹蒂主义（dandyism）^{[2]8}。丹蒂（dandy）是19世纪英法两国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群体，是当时社会时尚的标志。霍克（Deborah Houk）曾有这样的描绘：“无论是巴黎的大道上还是这个时期的文学中，外表优雅、衣着考究、打扮精致的丹蒂成为19世纪法国社会中靓丽的身影”^[5]。巴恩斯侧重对比了丹蒂在英法文化中的不同身份和内涵。英国的丹蒂更看重阶级出身，一般都是贵族；而在法国，丹蒂更多地与艺术相关，尤其指像多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e, 1808—1889）和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这样的作家和诗人。书中的主人公波齐虽然不是诗人出身，但他衣着讲究，从世俗意义上讲，“接近于丹蒂”^{[2]56}。书名“穿红衣的人”指的就是波齐在美国著名印象派画家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肖像画《家中的波齐医生》（*Dr Pozzi at Home*, 1881）中的形象。画中的波齐身着一袭红袍，领口和袖口露着里面的蕾丝衬衣，脚上穿着绣花拖鞋，一双纤纤玉手一只放在胸前，一只勾着细细的腰带，非常的女性化，完全符合当时社会对丹蒂的表象认知^①。而孟德斯鸠则堪称“贵族诗人丹蒂的典范”^{[2]57}。他酷爱各种收藏，尤其出名的是被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 1843—1907）写进小说《逆流》（*A Rebours*）中的那只镶满宝石的乌龟。巴恩斯不时将他与英国丹蒂的代表人物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相关联，呈现了他们作为丹蒂的共同艺术审美和追求。除了再现这几位主要人物作为丹蒂的生活品味之外，巴恩斯还重点介绍了波德莱尔、王尔德和多尔维利等英法文学艺术界真正的丹蒂们对丹蒂的艺术塑造和对丹蒂主义的理论阐释。在巴恩斯看来，无论在衣着还是艺术品味上，丹蒂都注重形式大于内容，是那个浮夸年代的缩影。

以三位主人公为代表的上流社会复杂的婚姻或两性关系是巴恩斯切入巴黎美好时代的另一个关键词。他以当时的杂货商庞廷（Félix Potin）印在巧克力上的“当代名人”系列^②为例，说明在当时社会“名望还是由男性主导的”：在第二辑选取的510位名人中，只有65位女性，而其中又有43位是“艺人”。就婚姻关系

而言，巴恩斯称这个时代正是美国作家沃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作品所描述的世界：“对金钱、阶级、家庭和性的要求互相碰撞，而性是经常妥协的地方——通常是在丈夫的要求之下”^{[2]41}。最为典型的就是波齐与妻子特丽斯（Thérèse）的婚姻以及他持续不断的婚外情。他们从相爱到隔阂直到最后分开，不仅仅是因为波齐的婚外情，还涉及金钱、宗教等其他原因。巴恩斯对比了英法两国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打破了人们的传统认知：保守的英国人相信爱情和婚姻，认为爱情走向婚姻，并比婚姻更长久；而一向以浪漫著称的法国人则赋予婚姻更实用的功能，可以为了社会地位、金钱或财产、家族的延续等结婚，但不会为了爱情而结婚。德波利尼亚克王子和美国富有的女继承人辛格（Winnaretta Singer）之间的“薰衣草婚姻”（一方是男同性恋者，另一方是女同性恋者）便是例证，巴恩斯以诙谐的语调描述了这种各取所需却能和谐相处的婚姻关系。而实用主义为导向的婚姻也导致当时社会中婚外情泛滥。巴恩斯以大量的例子说明在当时社会婚外情就像婚姻一样普遍，压抑女性的欲望是社会主导的性政治。社会舆论几乎不会对有婚外情的男性施加任何压力，但人们会在背后对女性（尤其是妻子）指指点点，如，波齐隐忍的妻子就被称为“波齐的哑巴”。但巴恩斯并没有将当时的两性问题简单化为单一的父权制，也没有因为波齐有婚外情而贬低他的人格。他呈现了这一时期两性关系的复杂样态：婚姻关系被赋予更实用的功能而失去了对情感的约束力，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既可以将婚姻作为维持其身份和地位的手段，同时还可以追求婚外的刺激，或按照自己的性向选择偏爱的生活；而女性因受社会的禁锢而选择余地有限，但也不乏有女性遵循自己的性向或意志自由选择，如，波齐的女儿凯瑟琳（Catharine）年轻时曾经历过同性恋，结婚后又成为诗人瓦莱里（Paul Valéry, 1871—1945）的情人，波齐的情人艾玛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甚至还有像波齐和孟德斯鸠共同的朋友（情人）、著名演员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 1844—1923）这样游离于多种性关系之间者。除了两性关系之外，巴恩斯还谈及了当时比较盛行的同性恋倾向。对王尔德的审判让后人熟知了这一时期英国对待同性恋的不宽容态度，而隔海相望的法国则是另一番情景。1791年同性恋在法国合法化，巴恩斯指出：虽然同性恋者在当时会面临被勒索或被指控等危险，但“（没有丑闻的）男同性恋者在巴黎社会中很受欢迎，女同性恋者则更甚”^{[2]60}。书中的三位主要人物，除波齐外，另外两位贵族都有着公认的“希腊倾向”（“Hellenic tendencies”），即，同性恋倾向。巴恩斯在书中详细探究了孟德斯鸠的性向问题并多次提及他与同性恋人伊图里（Gabriel Yturri）二十年的同居生活。他娓娓道来当时一些名人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和当时医学对同性恋的认定，还进一步剖析了同性恋与丹蒂主义之间的关联，援引多尔维利的观点，将丹蒂看作是“历史的双性同体者”，是对主流异性恋的一种挑战。

二、以历史昭示当下：“沙文主义是一种无知”

巴恩斯虽然在书中没有对宏大历史的系统梳理，但他将当时影响盛广的德雷

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③作为不断重复的关键词和重要背景，认为它是当时法国社会盛行的三种政治思潮的汇聚和集中爆发。一是“主张‘重振’旧高卢的血与土的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抬头”，二是“布朗热鼓吹的向俄国复仇的热望”，三是“全国范围内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反犹太主义”^{[2]28}。巴恩斯以此来凸显当时社会中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盛行，并以当时人们解决争端的两种主要方式——决斗和枪杀——作为切入历史的微观视角，以具体的事实说明当时的法国政治腐败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他将决斗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相关联，指出1880年代布朗热主义（Boulangism）盛行时和随后的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时都是决斗事件高发时期。书中列举了众多的决斗事件，有的起因不过是琐屑小事，如，文人门德斯（Catulle Mendès）和樊诺（George Vanor）之间因为猜测伯恩哈特在扮演哈姆雷特一角时的腰身发生分歧而进行决斗，导致门德斯差点被打死。文人们搬弄是非的一段话也会引起一场决斗，如，年轻有为的作家卡兹（Robert Cazes）因为记者维涅（Charles Vignier）搬弄了他和另一位记者之间的是非而决定与之决斗，结果遗憾被杀。这些随时发生的决斗说明它已经成为当时文人政客们解决口舌之争的主要方式。巴恩斯认为决斗背后有两方面的深层原因：一是法国人“轻率好斗、思想混乱和雷声大雨点小”的“林荫道心态”（“the mentality of the Boulevards”），二是当时法国的司法不健全：“一场决斗要比诽谤诉讼更快捷、更便宜”^{[2]43, 48}。

与决斗相关的另一个关键词“子弹”也是这个动荡时代的标志。法国革命让携带枪支成为了一项公民权利，但也导致了枪支泛滥，枪也成了决斗的主要武器。文中提到了两颗特殊的子弹：一颗是孟德斯鸠收藏的当年普希金在进行决斗时被射中的那颗子弹，另一颗是1871年法国政府在镇压巴黎公社时意外击中普鲁斯特父亲的一颗流弹。巴恩斯还提及当时几次重要的枪杀，如，轰动一时的汉瑞雅茨枪杀《费加罗报》（*Le Figaro*）编辑卡尔梅特的事件。他认为抛开背后的政治和情色纠葛，这也是当时枪支泛滥的结果。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生救人无数、写过40多篇治愈枪伤和其他战争损伤论文的波齐医生竟然也死于因医患关系而引发的枪杀。一位名为马丘（Machu）的患者因波齐做的阴囊手术而导致性无能，在到波齐家中就医时用随身带的手枪射杀了他。巴恩斯以这些充满暴力的决斗和枪杀来折射巴黎美好时代无尽的社会动荡和不安，呈现了当时人们感受到的另一幅图景：一个“充满着过度敏感甚至歇斯底里的民族焦虑的时代，政局不稳定，到处是危机和丑闻”^{[2]26}。

巴恩斯在“后记”中提及重构这段历史时所着眼的当代英国现状，即，当时轰轰烈烈的英国脱欧运动。2013年1月，英国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首次提及脱欧公投。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脱欧的喧嚣让巴恩斯感到了当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背后的极端排外主义情绪在英国的复燃。他引用波齐的名言：“沙文主义是一种无知”，认为这是英国历史的倒退，是“上当受骗”和“自讨苦吃”，表达了对英国脱欧的极度愤慨^{[2]265}。事实上，早在2017年4月，巴恩斯就曾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发表过一篇名为“日

记：人们又要开始痛恨我们了”（“Diary: People Will Hate Us Again”）的文章，他以沉郁的笔调表达了对脱欧的看法。他在文中谈及已故英国作家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 1928—2016）曾经推荐给他的西默农（George Simenon, 1903—1989）的小说《在克鲁尔家》（*Chez Krull*）。巴恩斯设想吸引布鲁克纳的或许正是小说中“土著与移民之间令人不安的角力，尤其一旦有事情发生时，任何小事都可能激起并引发种族主义者不断膨胀的怒火”^[6]。英国公投之后，巴恩斯在自己熟悉的伦敦街头看到和感受到了相似的敌意。外来妇女对像他这样年龄的白种男人都时刻保持戒备，而他熟悉的一位旅居英国30年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的法国女士决定要回国，因为她觉得“现在人们又要开始痛恨我们了”。巴恩斯以这句话作为标题并在结尾强调了“又”字的深长意味，脱欧又将英国带回到人与人之间充满紧张和隔阂的至暗时刻，他很难设想脱欧之后的英国会有什么光明前景。

巴恩斯从众多的历史人物中选择波齐作为“巴黎美好时代”的主角有其深意。作为外来移民后代的波齐思想开放、兼容并蓄，是“疯狂年代的清醒者”和“英雄”，是那个时代的真正希望^{[21]168, 266}。他以历史昭示当下时代，认为波齐所代表的包容开放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不断追求进步的科学态度正是近来日趋走向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英美国家所迫切需要的精神。2020年1月30日英国正式宣布脱离欧盟。巴恩斯在其官方网站分别用荷兰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向欧盟道别，表明了他在脱欧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并将希望寄予英国年轻的一代，相信他们未来会将英国重新带回欧盟。

三、真实与虚构的多维转换

在建构历史的同时，巴恩斯也将读者引向对历史建构本身的思考。首先，他强调建构者本身的心态和所处时代对历史书写的影响。在《终结的感觉》中，他曾说过：“我们必须了解历史学家的历史才能理解此刻摆放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版本”^[7]。他指出：“美好时代”不过是后人将对当下的不满投射到对过往的一种虚幻性建构，是由于缺乏他所称的“共情”（“empathy”）能力导致的结果，好的历史书写者不仅需要和所书写的主体还要和主体所处的时代共情，要尽可能回到历史本来的场域^[8]。第二，他揭示了历史建构背后的视角和材料选择。在本书的开头，除了三位主人公在伦敦购物的场景，巴恩斯还戏谑地列出了其他五个可能的开始：蜜月里读着法国作家于斯曼的小说《逆流》的王尔德、子弹、第一例卵巢囊肿手术、躺在床上思考如何实现人生梦想的波齐、标题中的那件红衣。这种不同可能的并置彰显了历史书写主体对材料的主观选择和安排。这些对历史建构本身的思考体现了巴恩斯对真相的一种根本认知：真相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面的，角度或立场不同，真相也各异。与《福楼拜的鹦鹉》中的福楼拜和鹦鹉一样，主人公波齐也拥有多重身份，既有好色之徒的一面，但也是“焦虑的一家之主”、“医生”、“旅行家”、“市民（势利者？）”、“国际主义者、理性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科学家、现代主义者”、“一个从未失去朋友的人”、“疯狂年代的清醒者”

[21]68。巴恩斯秉承福楼拜的教诲，避免将问题单一化或妄下定论，他对自己的材料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并以旁观者的姿态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例如，在梳理波齐的婚外情时，他发现缺乏“女性们给的证据”，而对唯一的女性波奇的女儿凯瑟琳留下的文字记录他则保持谨慎的态度，探究其中暗含的偏见和动机。他也会呈现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让读者在多种可能中进行判断和选择。在撰写波齐的生平故事时，巴恩斯对比了波齐的传记作者和凯瑟琳对他的不同定位：前者认为波齐在所有的婚外情中都是“很真诚的”，后者则把波齐比喻为令无数女人心碎的无法自持的“唐璜”；而巴恩斯将定论留给了读者：“真相也许就在这两个论断之间，除非真相能包容这两个方面”[21]69。对于一些无据可考的事情，巴恩斯索性承认自己的无知。如，书中有一个小标题名为“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事”，他在下面诚实地列出了20件我们无法知道准确答案的事情。他在书中一再重申：“我们无法知道（真相），但我们可以质疑”。这不是承认历史的不可认知，而是强调人们在建构历史时应持的一种怀疑态度，是“表达一种伦理”[4]。

与这种对待历史的开放态度相呼应的是巴恩斯独特的呈现历史的方式，他所呈现的不是线性的、连贯的历史，而是断裂的、片断性的历史瞬间，他将宏大的历史变成由历史中具体的人物围绕一些重复的关键词结成的纵横交错的网结，从不同的真相记录中抽丝剥茧，努力描摹出波齐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不同剪影。整部书没有章节的划分，只是偶尔有诸如“如何对待文学（社交中的）后辈”这样的小标题与巴恩斯酷爱使用的列表一起构成一个独立的小节。而他对历史事实的严谨态度并不妨碍他将他人的传记、甚至野史轶闻引入其中，并借题发挥，将之作为批判或揶揄的对象。因而，整体的风格亦庄亦谐，引人入胜。正如评论所言：“巴恩斯对波齐医生的叙述让读者随意徜徉在他所呈现的这个时代色彩斑驳的细节中，享受过程本身而不再寻找叙事”[9]。这种风格上的自由散漫与其主题上探求的多维真实互相印证，相得益彰。

巴恩斯还从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复杂转换来探寻真实的本质。他在书中生动呈现了孟德斯鸠与不同作家对他的各种文学再现之间的纠葛。在这些文学再现中，最出名的当属于斯曼的小说《逆流》的主人公德·塞森特和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的夏吕斯男爵。巴恩斯一方面探究了这些作品作为纪实小说(*Roman à clef*)的一面，如，于斯曼如何从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那里了解到孟德斯鸠的生活细节，并将它们写入了作品中，导致同时代的人们认为德·塞森特的所有生活方式都来自孟德斯鸠。尤其是于斯曼作品中描述过的那只镶满宝石的乌龟犹如福楼拜的那只鹦鹉一样，成了一件文学公案。而巴恩斯迂回于孟德斯鸠的日记、传记和于斯曼的作品之间，最终在孟德斯鸠的回忆录中找到答案：于斯曼对那只乌龟的描述的确基于马拉美对它的描述，证实了生活乃艺术之源。另一方面，透过孟德斯鸠的人生，巴恩斯也揭示了成功的艺术对生活的塑造。孟德斯鸠一生都生活在各种文

学刻画的阴影之下。他晚年虽然想通过写回忆录来呈现自己的真实人生，但其影响似乎从来没能超越文学家们对他的塑造。正如伯恩哈特所言：“尽管有历史，但传说总是占上风”^{[2]225}。孟德斯鸠与夏吕斯男爵之间的关系则体现了现实和虚构之间更微妙的转换。孟德斯鸠自称为“心地善良并有一颗美好灵魂”，但普鲁斯特笔下的夏吕斯则是“一个卑鄙的怪物”，然而巴黎的社交圈却一致认为“夏吕斯就是孟德斯鸠”^{[2]228}。继德·塞森特之后，夏吕斯成为孟德斯鸠后半生的阴影。虽然巴恩斯曾在《10¹/₂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¹/₂ Chapters*）中呈现了法国画家籍里柯（Theodore Gericault, 1792—1824）将生活转变为艺术的过程，但就小说创作而言，他认为：“即便是最具有自我意识的作家也经常无法正确解释他/她究竟做了什么，这是怎么发生的”^{[2]229}。这种从生活到艺术的转化更像是无数的化学变化，蕴含着现实与作者思想火花的无数碰撞和艺术家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艺术的真实可以超越生活的真实。

结语

巴恩斯以“无处不在”的波齐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围绕他的社会交往编织了“巴黎美好时代”的不同侧影：英法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浮夸的丹蒂风尚、复杂的两性关系以及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笼罩下动荡的社会和人们充满暴力的解决争端的方式——决斗和枪杀。在揭示了这一名称的虚幻性的同时，他以“巴黎美好时代”盛行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昭示当下英国脱欧的本质，表达了强烈的现实观照。在重构历史的同时，他穿梭于英法两国的文化对比以及艺术与生活的复杂转换之间并深刻反思虚构与真实的复杂关联，表达了一种多维的历史真实意识，与其小说创作形成主题上的互文性。而本书的风格也与小说一脉相承，辗转于历史、文学文本、传记和评论等众多不同文体之间，兼容并蓄，枝蔓丛生，既深入历史之中，又超脱历史之外，以细节代替逻辑，用一些关键词作为串联文本的网结，将趣味横生的历史与令人耳目一新的哲思雅趣融入恣意纵横的风格之中，传承了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开创的法国散文传统，是其散文创作的集大成者。

注释

- ① 霍克认为这种女性化的特质是丹蒂的典型性别身份特质之一。
- ② 巴恩斯在书中以及书的前后都附上了书中提到的14位当年出现在“当代名人”系列中的人物肖像，图文并貌，让读者更直观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的时尚。
- ③ 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向德国出卖情报，被判叛国罪，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不久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承认错误，直至左拉等知识分子的一再抗议，德雷福斯才最终被判无罪。波齐当时是德雷福斯的医生。

参考文献

- [1] 朱利安·巴恩斯. 另眼看艺术[M]. 陈星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9.
- [2] Barnes, Julian. *The Man in the Red Coat*. London: Jonathan Cape, 2019.
- [3] 郭宏安. 关于福楼拜的本质, 这个英国人说对了: 读朱利安·巴恩斯作品《福楼拜的鹦鹉》[N]. 文汇报, 2016年11月29日第011版.
- [4] Sehgal, Paul. “Julian Barnes, Playing Against Characters, Writes about a Character of Action and Appetit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18/books/review-man-in-red-coat-Julian-barnes.html>, 2021-10-12.
- [5] Houk, Deborah. “Self Construction and Sexual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Dandyism”, *French Forum*, 1997(1): 59-73.
- [6] Barnes, Julian. “Diary: People Will Hate Us Aga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 April 2017. 39(8).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39/n08/julian-barnes/diary>, 2021-12-15.
- [7] 朱利安·巴恩斯. 终结的感觉[M]. 郭国良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14.
- [8] Gallix, F., & Vanessa Guignery. “Interview with Julian Barnes”. Vanessa Guignery. *Novelists in the New Millennium: Conversations with Writer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2-26.
- [9] Gelin, Martin. “Julian Barnes’s Anti-Brexit Belle Époque”,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April 23, 2020.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julian-barnes-anti-brexit-belle-epoque/>, 2021-11-20.

The Fantasized History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risian Belle Époque in *The Man in the Red Coat*

LIU Lixia, LIU Jiali

Abstract: Julian Barnes’s new book *The Man in the Red Coat* unveils the fantasized history of the Parisian Belle Époque. Centering on the life and social activities of the famous Doctor Samuel Jean Pozzi, he reconstructs the prevailing social customs at the time with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es o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e pompous dandyism and complicated gender relationships. Meanwhile, he takes the far-reaching Dreyfus Affair as a major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highlights the social unrest and the prevailing chauvinism by presenting the violent means of settling disputes: duels and bullets. By paralleling the present Brexit with the Parisian Belle Époque, he expresses his great realistic concern. Following his consistent essayistic style, Barnes combines different genres, such as history, biography, literary texts and criticism etc. and shifts between constant comparisons between French and British cultur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art and life. He reflects o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while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and displays an awareness of the multi-dimension of truth.

The book exhibits the homogeneity and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his essays and novels.

Key words: *The Man in the Red Coat*; social customs; Chauvinism; multi-dimension of truth

「美しい」という虚飾
——『赤い服を着た人』による「パリのベルエポック」の再構成
劉麗霞 劉佳利

【要 旨】 ジュリアン・バーンズの近作『赤い服を着た人』は「パリのベルエポック」という名称が歴史を虚飾し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フランスの有名な医者サミュエルボルチの人生と社会的交流を巡り、独特の視点と詳細な歴史的考証によって、当時のフランス社会の主要な気風を新たに描き出した。すなわち、誇張されたダニー主義と多様なジェンダー関係。同時に、彼は当時の影響の深遠なドレフュス事件を主要な政治的背景として、そして当時の社会で決闘と銃殺を解決する主要な方法で、当時の社会の不安とショービニズムの隆盛を浮き彫りにした。彼は歴史を現代に喩え、当時盛んに行われていた排外主義によって現在の英国の離脱の現状を明らかに示し、強烈な現実的配慮を表明した。バーンズは一貫した作風を継続し、歴史を再構成すると同時に歴史の記述そのものを省み、歴史、文学テキスト、伝記、評論など多くの文体を融合させ、英仏両国の文化的対比、芸術と生活の複雑な転換を行った。歴史を構築すると同時に、虚構と真実の複雑な関係を深く再認識し、多次元の真実意識を体現している。同時に、そのエッセイと小説の創作のいくつかのレベルでの相互文と同質を明らかにした。

【キーワード】 『赤い服を着た人』；社会気風；ショービニズム；多次元真実